

1812

文史资料选编



蜀
康
12

刘旦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益阳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10013

1 · 辛亥革命前后的曾传范.....	曾纪勋
2 · 辛亥革命湖南起义中重要将领刘文锦革命活动事迹 片断.....	刘惠群
3 · 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刘承烈革命活动事迹片断.....	刘惠群
4 · 北伐战争的片断回忆.....	龙叔韬
5 · 我参加蒋军东北四平街战役的回忆.....	刘旦生
6 · 回忆益阳地区和平解放.....	龙叔韬
7 · 铁锅制造业怎样从益阳传入台湾.....	罗士奇
8 · 左翼青年作家叶紫的一家.....	聂中凡
9 · 会龙山几座墓葬人物略考.....	姚松泉

辛亥革命前后的曾传范

曾纪勋

曾传范，字绍欧，一八八四年（甲申、清光绪十年）出生于湖南益阳而东门外河岸的一个船户之家。一九五二年八月十日，病逝益阳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出生前三月，父亲去世，他是遗腹子，由母亲郭氏，艰苦抚养，他们同胞兄弟六人。

六七岁，大哥已能随同行商在四乡贩卖百货，二哥则去投军，三哥上了一艘民船作水手，继承父业。凭着他们的些许接济，家庭生活略有改进。他这位最小的胞弟，就能进入蒙馆，读书识字。十四五岁时，四哥已去一家皮蛋行作长工，五哥作“扎排”学徒。他的臂力最强，做学徒，也能获一份工资；而他更是将全部收入，又不花地交给母亲。于是舅母郭氏与幼子传范，已不虞饥饿。传范也更目发奋。

十五岁，投入本县名经师张缉熙老先生的经馆就读，立即得到张老师的赏识。张老师虽只是一名老秀才，且一生以授课为业，却具有新思想，他这经馆里，前人如顾亭林、黄黎洲、近人如梁启超、严复、谭嗣同的书籍，都有流传。此时，传范思想上，受到了启蒙教育。

一九〇四年（甲辰），传范去长沙，就参加了黄克强（兴）领导的华兴会。华兴会原定于慈禧太后寿庆之日，在长沙首先起义，不幸因湘潭的机关被清廷先行侦破，以致功败垂成。长沙的总机关被围捕，喜而主要人物都能走脱。传范逃回益阳，县里也无人知道他是华兴会员。

一九〇五年新春过后，再去长沙，知道黄克强先生已去日本，而各地的革命运动，已日趋蓬勃。恰是，广西巡防营统领湘人郭人漳创

办随营学堂，招募湖南子弟入营。郭人漳与黄克强有旧，这是华兴会员都知道的。传范即决定去桂林，投笔从戎。以前黄克强曾面告过，革命的力量，有赖于新军与会党。这时候，在长沙友人家遇到了葛谦（诞麟、湘乡人），这位有狂士之称的书生，对黄克强不胜景仰，与传范一见如故，两人就结伴一同赴桂林投军，郭人漳表示极为欢迎。

同年十一月，黄克强果然来到了桂林，且是郭人漳的座上客。原来，六月间，华兴会已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及其他的几个革命团体，合并组成了同盟会。共推孙中山先生为会长，黄克强为庶务长，会长远行时，即由庶务长代行会长职务，黄克强来到郭营，就在郭营召开同盟会，黄克强主盟，所有原来的华兴会员以及新收的革命志士，一同加盟，从此即为同盟会会员，当时加盟的，有林虎、梅雪仙、谭道源、赵新民、谭二武、杨锐锋、雷士 等八十余人。传范与葛谦更是实际负责奔走的干员。

有了这么多的会员，黄克强满怀希望，以为可用巡防营为主力，加上陆军小学的力量，即可在桂林起义，正是登高一呼，万山皆应。湖南、广东、江西、贵州等省的革命力量，必也闻风而起。可惜，由于当时内部意见尚未统一，因而拖延了起义时间。

黄克强先生在桂林停留了三个多月，直到明了起义无望，才不得不转赴龙州，再转越南而终于留在香港，指挥同盟会南方支部，孙中山先生为了筹募革命经费，经常在海外，会务须由庶务长处理。

黄克强离开桂林之后，桂林起义，更成泡影，葛谦再也忍耐不住，他就只身东渡去了日本，桂林的同盟会，仅由传范保持有限度的活动。一九〇七年春，郭人漳由粤督岑春煊调往广东，传范也即随同到广州。

到了广州，自然也即与香港的黄克强取得了联络。相继又结识了广东巡防营里有名的红笔司书罗衡苍（湖南新化人）还有谭复（湖南

湘乡人)黎季(湖南长沙人)粤人姚雨平、邹鲁、朱执信等。为了直接渗入新军，传范即承黄克强之命，投入虎门达成学堂，就全力在校内开展同盟会的活动，随即由同盟会总会指派为虎门分会主盟人，与广州分会主盟人姚雨平共同负责巡防营与新军的活动。

虎门陆军建成学堂，专为训练新军。由于清廷极为重视，很多旗丁人子弟，都受命入校习军事。全校共有旗籍同学数千人，成了同盟会，其活动大受阻碍，传范的大部份活动都被他们所破坏，几乎还暴露了身份，幸不过幸他们吸收了几千名同学，如何秉钧等后来都成了“保亚票”运动中与“庚戌新军起义”的坚贞战士了。

传范在虎门的工作刚告展开，葛谦即由日本赶来广东，与传范相邂逅后，即介绍了广州的会员，并推荐他在广州相助姚雨平，因为在广州各方面活动的湘籍会员为数甚多，更须有专人司联络。

这时一班负责军事活动的会员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：对知识水平太低的军士宣传革命，使之加入同盟会，他们对革命组织的认识，总比较难领会，倘使效法于唐本常的汉口之役，发放王富寿票，那就一蹴即成，明证较易接受。恰是谭复在湖南湘乡人于到达广州，他十分敬仰黄克强，而又与哥老会的首脑们有极深的关系，旋即由葛谦陪同他去香港见了黄克强，并即加入同盟会。他是极力主张在军营里改变入盟方式的，于是决定了“保亚票”的名目，开始向军营散发。

“保亚票”的工作，未算十分顺利，在军营里，有姚雨平与传范，邹鲁、黎季等的支持掩护，短期内，共吸收了数千人。广东各地民军，也多与同盟会取得了联系。

一九〇八年，清帝光绪与太后慈禧亦相继去世，全国官吏忙于国丧，传范认为“保亚票”已有数千至万，实可乘时在广州起义，首府动摇，全省军民必然一呼而至，大功告成。就在这密锣紧鼓、磨拳擦

掌之际，专司递送布票的会员严国铎，在百忙中，失落一张“保亚票”，为水师提督李准的卫兵收获；密报李准。李准即派人跟踪，直得机关之一，逮捕了严国铎与钱占荣，得到了另一机关地址，又逮捕了葛谦。葛谦这机关，保存有“保亚票”的重要文件，一经搜获，所有负责人，全可按图索骥了。就在水师亲军中营逮捕了传范；亲军右营逮捕了罗澍苍。稍后，又逮捕了黎尊。谭复逃脱了，但他辗转广西柳州，仍被清廷逮捕押回广州。葛谦与严国铎，当时就义。谭复、罗澍苍、黎尊长系监狱。传范与钱占荣分别递解回籍，长期监管。谭复卒在狱中失踪，当然是清吏秘密杀害了。

“保亚票”一役，遂以一票之遗失而完全失败，而李准则向清廷立了一场大功。

传范被递解回籍后，县知事认为他新旧学均有所长，也另眼相看，颇受优待。仅在狱中两个月。一九一〇年新春，即由县绅具保外出。传范为了表示无意逃走，还就聘为某校教员。可是出狱的第一件急事，就是与长沙方面的朋友联络，即知道黄克强正驻足香港，负责同盟会会务。而革命起义，更是此起彼伏。于是他就乘人不备，悄悄地逃离益阳而奔广州。

然而旅途阻滞，到广州时，正是三月下旬，也是黄花岗起义前夕。黄克强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广州，原定二十八日发难。传范于二十七日见到黄克强，当时一切部署以及先锋（敢死队）人选，均已确定。黄克强即着传范参加由其亲领的一队，进攻督署。

这时，风声已露，杀害革命党人最多的李准已有周密防卫，又有枪械运送不及的问题，党人中就有人提议改期。黄克强坚持不可，因为动员不易，改期等于解散。结果，推迟了一天，改为二十九，就此一改，也使得很多处失了联络，甚至产生误会。

最初，统筹部定下的十路进攻，临时改为四路：一路由黄克强率领攻督署；二路由姚雨平率领攻小北门迎接防营及新军入城；三路由陈炯明率领攻巡警教练所；四路由胡毅生率领守大南门。克强先生抱必死之心，此一役，不成功，即成仁，传范相随，当然具同一志愿，当天上午，姚雨平匆匆来见黄克强，是他领用枪械方面发生了误会。黄克强即派人前去解决，并见到传范与姚雨平。

新军与防营的一些事务，立即改派传范协助姚雨平分担迎接新军入城的任务。

自传范因“保亚崇”被捕而后，关于防营与新军的发展工作，先由田映典接替。姚雨平也因“保亚崇”而不能活动。而庚戌广东起义，倪映典殉难，然后，再由姚雨平负责。传范与姚雨平，由最初分别负责广州与虎门同盟会，共同联络巡防营与新军，再进到一同策划“保亚崇”本是老伙伴。此刻，姚雨平负责迎接新军与巡防营入城；黄克强派传范相助，实属最恰当的调度。传范本想坚留在黄克强身边，而黄克强则认为助姚责任更重大。

传范即随姚雨平来到了集合地点嘉应会馆，已集合一部份先锋，甚多是“保亚崇”的旧友。他们似还不知道传范已回到广州，相见之下，更是意气风发。可是领取枪械的仍然未见回来。姚雨平不得不亲自前去查问。而姚雨平此一去，竟也不见回来，传范情知不妥，即嘱各先锋暂行静候，倘是城内外消息不通，新军不来接应，各人即自行散避。

传范独自赶进城来，已知发难，而行动有军替加以监视，如非见机，已被拦截逮捕。在无可如何中，躲入了一家相识的“云吞档”，是粤语，即是“馄饨摊”。清季广东所有城乡中，经营此业的，全是湖南湘乡人，是随湘军入粤后定居下来的。由于谭复、葛谦都是湘乡

人，这些“云吞档”的东主或店伙，有很多都加入了“保业崇”，传范因而认识不少，也因他们获得不少活动上的便利。

外面的风声紧急，不仅生还者，无法联络究竟死难的数目有多少，也只能凭报纸上刊载收集尸体的数目而得大略。传范料知黄克强必然是凶多吉少。痛心疾首之余，仍是不愿离开那正在大举搜捕的广州。在那“云吞档”里混了两天，未见报纸上刊载黄克强尸体的消息，想到定脱难，因为如有黄兴尸体，这是清吏邀上一场大赏的机会，必会有很多沾染。

十月初，终于知道黄克强已安抵香港，受了伤，正在养伤。再过了几天，就悄悄地到香港与南方支部接触，也见到了黄克强。此一役，使广州的多年经营，大伤元气。黄克强先有奋不顾身，只身刺杀李准之意，后经孙中山先生一再致电劝阻，也即改变初衷。在广州仍然以刺杀清廷大吏为务，而革命活动，则转注意各地防军与民军。传范因与西路统领隆世储有旧，隆世储部管带蔡向荣（益阳人）更是同年的莫逆交，就问黄克强提出亲赴西路肇庆。克强先生立即鼓励，促其就道。

传范到肇庆之后，隆世储表面上十分欢迎。当时的清廷官吏，很多都是装得具有新思想，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，并不正面敌视，可是要他公然起义，他就会推三阻四，保持观望，以便看风转舵。郭人漳如此，甚至李准之流也多少如此。隆世储更是不会例外，郭人漳此时，已因防城之役，拒绝同盟会的促请起义，使王和明功败垂成，清廷特予嘉赏，升官二品。反将强劝他起义的葛谦恒之人骨，禀请督署严加缉捕。

传范在隆营停下来，只要隆世储不正面干涉，他就与蔡向荣以及一班有志之士，共策进行。正式吸收同盟会员，由传范主盟，传范原

是总会派定的主盟人之一，随时随地，都可主持加盟事务。这些名册，还送到了香港南方支部，黄克强曾多次致函鼓励。当时，广东各地民军，由姚雨平、朱执信等分途活动，极有成就。不过彼此之间，缺乏周密的联系，不易定出一个共同起事的确期。在这酝酿中，武昌首先发难，即是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。（双十节系阳历，阴历是八月十九，以后的日期还是根据阳历）

义旗高举，湖南首先响应，随即是江西、陕西、贵州，而清廷复派大军水陆两路，夹攻武汉。黄克强先生即匆匆就道，赶往武汉督战。

广东各属民军，闻风出动。而姚雨平、朱执信等，更在广东故意制造种种谣言，说是随时随刻有大军入城，使署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惶惶不可终日，张鸣岐为施缓兵之计，应允在九月九日宣布独立，结果到期又忽悔约。传范忍无可忍，即请隆世储一面宣布西路独立，一面率领西路防营直入广州。隆世储还是推说广州军力浩大，不可以鼎击石。

传范以不能再缓，即召集各营官长于九月十九日将防营三营及水师三营，一律集中肇庆，宣布西路独立。将隆世储请了出来，他见到部队已不由自己指挥，再也无话可说了。传范取出了拟好的电文，着隆世储签署。分别致电香港及各省。更电广州张鸣岐，限令立刻投降。已不是再要他独立，并即成立了“肇罗军政分府”。罗是博罗。仍推隆世储为分都督。改编防营为罗防营与肇防营，分由贺蘊珊、李耀汉率领，直趋广州。

这是九月十九日的事。二十日，收到姚雨平与黎粤的广州来电，广州已经独立，张鸣岐与李准都逃跑了。罗澍苍去香港，迎潮汉民前来出任都督，广东就此算是全部独立了。但当时的形势，并不完全如此顺利，广东如此，各省也复如此。最主要的是革命军力庞大，而质

量庞杂，面对久经训练的北洋军，实是一大困难。

所以，传范很珍惜那西路的两营兵力，当各路民军蜂拥入广州之际，他却按兵不动，就这军政分府总参议的名义，督使两营长官淘汰老弱，增补精壮，酌量扩充员额，以备北上。

孙中山先生尚在海外，黄克强去了汉口，同盟会在南方的最高负责人，就是南方支部的胡汉民了。姚雨平、朱执信、黎等，当然欢迎汉民回广州出任都督。新都督的第一件事就做得很妙，他几乎是肯定的说出：李准是革命大功臣，最近有信向同盟会输诚。他可没有想到前前后后被李准杀死的革命志士有多少？更忘记此刻欢迎他回广州任总督的黎等、罗澍苍是李准投之入狱，九死一生的同志，率众起义的姚雨平、黎等不满、传范也不满，对这位刚愎自用，气量狭小，眼光短浅的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，早就不满，只因以大局为重，从无表露。

黄克强到汉口，亲上前线，政局曾一度好转，终于要退守汉阳。而湖南的都督焦达峰被刺，推出了世袭官僚谭延闿任都督，这与武昌推出黎元洪，可说是互相“辉映”。

克强先生得知传范西路起义详情后，即来电分咐传范尽快率领老军北上应援。老军者，就是训练有素而并非新兵。传范就地组成“肇罗北伐军”十一月份出广州，即行北上。十二月抵达南京，各省都督已推定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。黄克强以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。传范率部抵京不久，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北伐军也达到了。广东北伐军原三标，姚任总司令。陆军部看肇罗北伐军并入广东北伐军内，成为第四标，传范任标统。传范与姚雨平老友相逢，更是无分你我，高兴之至。

当时，各地民军涌到，而质极差，急待编整，谈何容易。幸而孙中

山先生委派了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出任南京卫戍总督，极力维持治安。总统府，则是由同盟会会员组了一个侍卫队作警卫。陆军部应有的一些差遣警卫，黄克强部长就派定了传范这一标担任。传范还编组了一个侍卫班，这个侍卫班，在黄克强出任南京时，多次遇刺，都能化险为夷，为保卫革命领袖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袁世凯对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，深为不满而大弄阴谋，又不便公然反目。趁南京临时政府一切待举之际，竟唆使头脑简单愿作清廷奴隶的辫子军张勋出兵攻打南京，可能袁、张都以为南京的革命军不堪一击，而袁世凯更是得计，不论张勋为胜为败，都是有利的。张勋由徐州出兵南京，大总统孙中山、陆军部长黄兴都认为必须全力痛击。当然，迎战张勋，必须调遣战斗力较强的部队，于是，便令派广东北伐军上前线，传范率领第四标，更是充当前锋。第一仗在固镇相遇，将辫子军打得落花流水。第二仗在南京宿州，更是予以痛击，使张勋不得不放弃徐州而逃回山东。传范奉命就此驻守南京宿州，以防张勋再犯，并由陆军部明令嘉奖。

然而，这只是袁世凯的暗中试探。相继而来的阴谋，阳谋，更是日益加剧。孙中山先生终至辞卸大总统职务，离开南京，由黄克强任南京留守。为了认真实行军队的编遣，传范所部即由留守部首先遣散。这表现了黄克强大公无私的精神。谁都知道，传范的这一部队是克强的警卫军。不过，留守部的局面，终也难于维持，而黄克强也终非自行解职不可。

黄克强离开南京后，传范仍然只身留在南京，已无军务，却仍与各军军中朋友紧密往来，为一九一三年二月革命的讨袁军的组成，作好了准备，不过这已属于二月革命的事迹，不在辛亥革命范围之内了。

（本文作者是曾传范先生的儿子曾纪勋，现住香港九龙，由我而

政协曾海楼委员托回大陆访问的刘建勋先生与曾纪勋先生联系后，由他将此文寄给我会。）

益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

辛亥革命湖南起义中重要将领刘文锦革命活动事迹片断

刘 惠 群

辛亥武昌革命爆发，炮声一响，全国震动，湖南以近在邻省，所受影响尤巨，更以在事先两地革命志士早已经常有密切联系，人员来往频繁，在武汉之地下革命机关，已对长沙方面具有如臂使指之效能故于武昌革命一起，即行紧密配合，迅速在长沙发难，乃能响应在各省之先，距武昌起事不过十日。

武昌革命前，在湖南省垣长沙驻有新军两个标（每标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团），即第四十九标，第五十标，而满清绿营兵不过是数百人新军在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，完全控制了长沙防务。新军中有军官以至士兵，皆倾向于革命，平日已群情激昂，士气高涨，只待时机之到来，故革命号令一下，进行极为迅速顺利，仅于一夜之间，即解除绿营兵的武装，包围巡抚（即省长）官署，巡抚已知无路可逃，自缢身死。其余有藩台（财政），臬台（司法），道台（民政），知府、知县以下，悉向革命军投降。当时刘文锦任第四十九标标统（相当于团长），乃能率领第五十标，指挥部队占领各重要军事据点，完成各项革命任务，以此一极短之时间内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，其对革命所建树的功绩，是不可磨灭的。

刘文锦，字曙，原系阳邑（即今之舒兰）人，（现为桃江县倒山区荷塘公社）。于光绪年间考入陆军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。毕业后分发来湖南，初任排长，以后逐级晋升，革命后晋为陆军少将。在学校时即接受革命思想，与同学多人加入兴中会的秘密组织，来湖南后又与黄兴取得联系，受黄兴的影响甚深，以后两人竟成为好友。

驻湖南新军中的军官，初起时同情革命者并不多，经过刘道一。

文锦等人士数年之间的广为联络招引，或利用假日邀游名山，或朋友身份见访，长谈于密室；将革命大义宣传开导，遂使军官绝大多数（尤其是下级军官），皆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，故能于临期发难，一举即成。

在湖南的革命团体，与设在武汉的地下革命机关，须保持密切的关系，刘文锦本人有时因要事不能亲自去武汉，以与刘公、孙武、蒋武等人会商革命进行机宜。但为避免引人注目起见，只好化装成普通小商贩，挤在客货混合车中，然而时间一长，次数一多，似此还不能以保证安全，幸当时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之间已通车，广大铁路工人，革命热情甚高，有一次刘文锦赴武汉，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，化装成火车机车司炉工人，身穿工作服，满脸煤灰黑污，使外人才能辨认，到武昌后待至夜间，始洗脸更衣外出。可是满清官吏，对新军暗中监视甚严，对刘文锦的一些活动，已有所察觉，在巡抚署内的革命同志，将此风闻传出，迫使刘文锦本人不便擅离长沙，以后有几次是派亲弟刘麦岐（当时由刘文锦推荐在补充营某连任司务长），持他的亲笔缄札，代他去武汉与革命机关的负责同志接洽。

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，本因临时被迫仓促起事，举事前夕，并未对湖南方面颁发指示与计划，信息传来，新军中官兵上下，皆弄不清事态发展，为了摸清真实详细情况，刘文锦乃急派刘麦岐连夜乘车赶往武昌，向革命领导同志请示机宜。只两日返回，带来多项具体指示，使在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，以极其神速的行动决定湖南局面，迅即抽派部队组成援鄂军，驰赴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，这对于武昌新诞生的革命政权，军心民气，都是给予了一个极大的鼓舞。

在起事前两天，曾秘密召开两个标连长以上军官会议，经一整夜

之详细研究，制订出周到之作战计划。湖南军械局被列为重要占领目标之一，因其中贮存枪械数千枝，以及弹药数百箱，恐被满清官吏闻讯予以爆炸破坏，故必须完整无恙地占领。在会上指定四十九标第某连连长刘安邦担任此项任务。（刘安邦为刘文锦族弟，原益阳县桃江乡之窑湾人，现为桃江县双江公社）。刘安邦接受任务后，在起事之夜，趁深夜黑暗中，率部摸近军械局，即展开兵力，以一部由屋后架木梯越墙而入，一部在前面冲破大门而进，军械局有守兵数十人，于睡梦中突破惊醒，尚不知发生何事，未发一枪一弹，就悉数被擒，所以枪械弹药皆丝毫无损。故于胜利后迅速招募新兵数个营，扩充兵力，配合老部队编组援鄂军，全力支持武昌，乃能不用愁械弹之缺乏。

新军中有小部分骑兵，马匹按规定每隔几年须更替一部，当时新军领导人向满清官吏提出，须往内蒙古购马，并推派刘文锦率数人前往，真实用意是要经武汉再往北方各省联络革命同志。但狡猾的满清官吏，因出于对刘文锦等人的猜疑，乃将计就计，声言湖南巡抚只能呈报两湖总督，须到武昌总督官署换开公缄，方可前去内蒙古。但革命党后由所缴获的案卷内查出，实则湖南巡抚已密电两湖总督，待刘文锦等到后换文时，必予以严加考问，或将其监禁，或给予加害。幸而刘文锦等人到武昌后，经革命负责同志劝告，以革命时机眼看成熟，随时可能举事，此际切不可远离驻地。刘文锦乃谎称由商场得采行情，内蒙古本年马匹上市无多，难以选购好马，故暂不宜去，乃自武汉半途折返，更无须去总督官署换文，遂未中其奸计。

戊戌政变中谭嗣同惨遭西太后杀害，谭为浏阳人，其故里靠近长沙。梁启超来长沙时务学堂讲学，谭嗣同推介之力居多，谭本人的著作，亦已广为流传，使湖南社会上的风气为之大变。故对于谭的惨死，为之鸣冤与惋惜的人极多，西太后死后，宣统年间，谭嗣同的乡亲故友，

在长沙公开设祭追悼，刘文锦送有祭轴一幅，上书“湘水无情”四字。此事表面上似与革命无关，但内实含有对满清政府深致不满之意，证明即使是保皇派中人，也看出清廷不足与有为，非进行革命不可了，当时在社会上殊有不少的影响。

新军中军官对兵士在讲堂授课，每次皆寻找机会，借题发挥，旁敲侧击，揭露满清政府的黑暗腐败，激发士兵们的革命心情，日久习以为常。有次由刘文锦到讲堂对士兵讲话，因言词激烈，士兵们听后群情激愤，以败起立高呼“赶走满鞑子，光复中华”。此事传到满清官吏耳朵内，大为震惊，即欲找刘文锦追查，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措施，革命就已经爆发了。

笔者与刘文锦为伯侄，与刘麦歧为父子。所记这些片断事迹，皆得之于老两兄弟的口述。但因历年太久恐有不少遗漏与挂误之处，还请亲身经历辛亥伟大革命的先辈们，赐予指正。

政协益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

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刘承烈革命活动事迹片断

刘 惠 群

刘承烈，字绍襄，湖南省原益阳县桃江区之舒凤乡人，（现桃江县修武区荷塘公社）。为刘文锦之亲兄。出生于1881年，死于1952年。死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参事。

刘承烈自幼年起，先在本县龙洲书院，以及长沙岳麓书院等处求学，至二十岁左右，因其父刘宾在甘肃省任知县，远道前往探亲，遂就读于甘肃省城兰州之某书院，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，于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。

当他在兰州读书时，恰值谭嗣同由内地赴新疆，途经该地，在甘肃之湖南人，设宴于两湖会馆以表欢迎。刘承烈亦参加宴会，谭嗣同即席发表演说，宣扬君主立宪。因当时国内革命思想尚未普及，刘承烈亦未曾置可否。待他后来到日本留学，因留学生中绝大多数已接受革命思想，故常有学友邀他去听孙中山、黄兴等人的演说，并常阅读章太炎主办之刊物，至此时刘承烈的思想大为转变，认定必须进行革命，方可挽救国家，造福人民。乃毅然加入同盟会为会员。并与学友一道劝说在他之后到日本的留学生，也参加革命组织，他已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。

刘承烈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，并未立即回国，而是留任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，与胡汉民、戴季陶、居正、覃振、汪精卫等人共事。并与黄兴、宋教仁、蔡元培、陈英士、章太炎诸人甚为接近，友谊很深。

同盟会因在南方各地数次小起义皆告失败，乃于1910年春决定在广州大举起事，由黄兴担任总指挥，先期赴香港主持军事准备工作。